

胡乔木

谈中共党史

乔木文丛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鲁 静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朱启环

责任校对:罗世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

(乔木文丛)

ISBN 7-01-001829-4

I . 胡…

II . 胡…

III . ①党史-中国共产党 ②中国共产党-党史

IV . D232

乔木文丛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HU QIAOMU TAN ZHONGGONG DANGSHI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

人 人 书 展 台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3.75 插页:2

字数:300 千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01-001829-4/D·488 定价:33.00 元

《胡乔木传》编写组

组 长 邓力群

副组长 程中原

成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玉祥 卢之超 刘中海 朱元石 李今中

李良志 张秋云 郑 惠 胡木英 徐永军

《乔木文丛》各卷编辑人员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主 编 郑 惠

编 辑 鲁 静

《胡乔木谈新闻出版》 主 编 商 恺 朱元石

编 辑 曹学海 王玉祥

《胡乔木谈文学艺术》 主 编 程中原

编 辑 夏杏珍

《胡乔木谈语言文字》 主 编 凌远征

编 辑 宋林林

全书资料工作 李今中 张秋云

出版总负责 王乃庄



胡乔木

信
件
存
档

同意将本同志的原函存档

陈云 84/11/27

① 陈云同志：

关于您对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的写成日期，
原来只说是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行军途中（按
即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至五月二十九日的一段时间），这段
时间太长了，也不合情理。
时间太长了，现在查有关资料，拟改定为从威信到
鸭溪的行军途中，即三月中旬至三月底。理由如下：

(一) 提纲内讲到“洛甫代博古负总的责任”，
这事发生在二月五日前后，地点在遵义至习水。二月十
日，红军进驻扎西，休息了一天，此日洛甫向中
直机关营科去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遵义会议决
议，因此，我只能肯定得过时间不会早于那时。

84年

致陈云的信手稿

7. 39420 70 (11388 - 200)
8. 48000 60 (15200 - 2700)
9. 50000 11 (3800 - 2175)

12大文件的量比历次文件少而精，但是④毛毛不能全部理解，现在只以 12大报告为中心，讲几个主要④毛毛方面和写了哪些已经提出的主要问题。

第一，为什么记十二大是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为什么说全面开创新局面，这不是七大到八大期间的工作，而是充分加以肯定，这样才好相比。也不提八大，只是表明十二大以后不会再像八大以后遭受那么多的曲折。八大的思想准备④经验准备都不够，因此，这次八大④通过的决议和决策都还没有能完全实现，甚至很多决议被搁浅了。从这一上说，八大有些像七大。七大一样，都会经过理论实践教育④训练（七大没有那样集中地学习过，但这个会议中会拿起新的工作而且，这次的纲领都是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形成的，组织上也已经作了准备。这方面开创新局面，就（要）把三中全会多方面的成就转化为全面的总结，过去今后各方面的工作都比较突出的和平时期。七大与七大有不同之处：有了全国政权，经济更复杂许多倍，党内

《十二大的重要成就》讲话提纲手稿 (1982.10.8)

《十二大的重要成就》讲话提纲手稿

《乔木文丛》出版说明

胡乔木(1912－1992)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长期担任文化思想和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职务，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和建树，其中最为卓著、最具开创性的领域是中共党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乔木文丛》即由《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胡乔木谈新闻出版》、《胡乔木谈文学艺术》、《胡乔木谈语言文字》四卷专题文集构成，相当全面地记录和展示了胡乔木在这些领域的指导作用和学术成就，说明他不愧为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开拓者，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中国文字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推进者。这部文丛是对已经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的补充。文丛收录了胡乔木几十年来对上述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章、讲话，还选收了许多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稿、讲话、谈话以及书信。它是胡乔木毕生创造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不仅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对中共党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也有长远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胡乔木传》编写组

1999年6月

目 录

《乔木文丛》出版说明	(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1)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24)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	
档案要为党史研究服务	(29)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关于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起草情况的说明	(30)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	
起草《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	(42)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	(45)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	
《历史决议》要有一种理论的力量	(51)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	
对一九五七年后几段历史的议论	(60)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	(70)
(一九八〇年六月九日)	

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	(73)
(一九八〇年七月三日)		
毛主席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	(77)
(一九八〇年七月五日)		
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	(81)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		
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	(85)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		
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	(89)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思想是团结全党奋斗的旗帜	(96)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	(102)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三日)		
《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	(111)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	(128)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文化大革命”是个内乱	(134)
(一九八〇年九月三十日)		
陈云同志的三条意见	(137)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	(139)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		
对《历史决议》学习中所提问题的回答	(148)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四日)		

十二大的重要成就.....	(173)
(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	
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	(205)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四日)	
关于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成文时间的考证.....	(223)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关于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个史实.....	(225)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	
希望写出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史的科学著作.....	(227)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对党史编写中四个问题的答复.....	(232)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九日)	
党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	(234)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四日)	
如何写好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这段历史.....	(245)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党史应拿出权威性的材料,要有些新东西	(252)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的讲话	(256)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	
略谈八年抗战的伟大意义.....	(264)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	
答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提问.....	(277)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日)	

对编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党史

- 大事记的看法 (284)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日)
- 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 (288)
(一九八八年八月九日)
- 党史要写清楚历史脉络 (298)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日)
- 先讲清政治形势，才能讲清党的政策 (307)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 写党史要有三个新的态度 (310)
(一九八八年九月八日)
- 从大革命到抗战时期党史的若干问题 (332)
(一九八八年十月四日)
- 关于南方局党史的编写及其他 (341)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九日)
- 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 (345)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 (354)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 关于写作《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设想 (365)
(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一年)
- 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 (387)
(一九九〇年三月八日)
- 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395)
——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作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	(422)
(一九九一年八月)	
编后记.....	(42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意义非常重大。这两个会议的文件，按照中央的规定，将陆续传达、布置学习。今天，我要讲的，是就这两个会议的文件的主要精神，按照我的体会提出几个最重要的问题，给大家在学习时参考。

许多同志都说，很多年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了。这两次会议恢复了我党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次会议反映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的一个伟大进步，说明我们党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多年的打击破坏以后，恢复了自己的光荣传统，重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规定的工作方法，党内的民主制度，来进行工作。这种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三中全会要求把它扩大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间去，永远坚持下去。而且，这两次会议还解决了党的历史上、党的生活里、国家的生活里很多年

* 此篇是1979年1月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大会上的报告。标题是收入《胡乔木文集》第2卷时加的。

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两次会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开得非常好，受到全党的热烈拥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现在我想从三个方面讲讲这两次会议的意义。一、这两次会议，决定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变；二、这两次会议回顾、总结了我们党在三十年中间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三、会议回顾、总结了党在建国以来，特别是二十年来，主要是一九六六年以來的许多根本的问题，重大的历史问题，总结了党的生活的历史经验，这两次会议既然在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这样深入的得到重要结果的讨论，在党的历史上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都着重地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全党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是说，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揭批林彪、“四人帮”这样一个政治大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了它的任务。尽管有一些地区、部门在这个方面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继续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就全国范围说来，这个任务在绝大部分地区、部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了。因此，党就能够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一个主要任务方面来。

我们党提出在一九七九年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我们没有提出过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个转变。在历史上已经提出过，而且已经开始。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从来认为，我们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一直到将来条件成熟时，转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党的根本纲领、根本任务。在几十年中间，我们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根本目的就是这个。我们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不是为阶级

斗争而阶级斗争。革命、革命战争，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为了达到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法。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也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也是一个方法，一个手段，目的还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后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理想。还在革命战争中间，在有了根据地以后，我们就开始经济建设。那个时候的经济建设，一方面是为了战争的需要，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一方面又是要解决人民生活里的迫切问题。可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建设，要受到许多限制，当时我们同敌人进行着生死斗争，不可能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当我们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这个任务马上就提到我们面前。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规定，占领了城市就马上要把生产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党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而不要乱碰乱撞，妨碍、贻误这个中心。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首先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同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包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内容，而这个内容是放在三大改造的前面。正因为是这样，毛主席才能够在一九五六年对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做出总结，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时候，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一九五七年夏天，发生了右派进攻和我们对右派的反击，毛主席后来把它表述成为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到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把技术革命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且在同年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所有这一切都是说，党中央早已把着重重点的转移、工作中心的转变提到议事日程上，并且做

出了规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公报里面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正是这些工作,奠定了我们现在在新的条件下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的物质基础,同时也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曲折。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些曲折并没有使得我们离开这一工作中心,只是我们在工作方法上有一些失误,有一些差错。从那以后,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到一九六六年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已经达到的水平。

一九六六年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可是一开始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虽然周恩来同志、陶铸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跟林彪、“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但是这个方针终究没有能够得到认真的执行,因为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太厉害了。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这段时间,国民经济在党中央、各级党委、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有过一段上升。可是到了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在所谓批林批孔的口号下又进行了新的破坏,国民经济受到了很大损失。一九七五年,毛主席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多数同志坚决执行,使得国民经济重新上升。到了一九七六年又受到“四人帮”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次更加疯狂的破坏。这次破坏超过了历史上历次的破坏,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造成了我们恢复国民经济的根本条件。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两年中,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对林彪、“四人帮”揭、批、查的政治革命。这个政治

革命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场革命斗争，要在一九七九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两年也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现在需要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而且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基本的条件是因为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揭、批、查的斗争已取得全国范围的基本胜利。这表现在六个方面：①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粉碎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②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及其反动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分清了路线是非；③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清除了那些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④对林彪、“四人帮”迫害所造成的大批冤案、错案的平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⑤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⑥实现了安定团结，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因为有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根本胜利，在一九七九年实现这个转变是完全可能的，同时也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现在把工作中心转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同以前时期比较起来，我们现在的物质基础更加强大，国内、国际的条件更加有利，但更重要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要实现这个转变的思想认识更加统一，更加明确，更加清醒。大家都承认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革命斗争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如果不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来，我们就不可能完成革命的根本任务，不可能达到革命的根本目的和根本要求。那末，我们就对不起为革命牺牲的无数先烈，对不起全国人民，也对不起子孙后代。

革命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要靠经济建设才能实现的，离开了经济建设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